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21.04.022

# 黑龙江流域早期的采金业 与国际移民研究(1850—1920)

赵欣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136000)

[摘要]黑龙江流域自1850年代以来,以盛产于易于人工开采的砂金而成为东北亚工业化的肇始,拉动了以金矿区为原点的中、俄、日、朝等多国淘金客组成的向心式移民。随着采金区从黑龙江源向上、中、下游拓展,这些淘金移民以黑龙江为中轴线形成了或流动、或固定的工业移民社区,构建了跨越政治、种族、语言、文化等多重障碍的新型国际移民社会,成功开启了以工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多元经济开发模式。

[关键词]近代;黑龙江流域;采金业;国际移民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21)04-0173-08

采金业是黑龙江流域最早出现的工业,它以黄金的巨大诱惑为纽带,拉动了以黑龙江水系为中轴线的对称型的中外双向移民,构建了具有典型特征的新型国际移民社会,深刻影响了黑龙江流域的整体开放与开发。目前,学界对黑龙江金矿的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个案研究或单纯的工业、地质层面,鲜有探究其深层的移民社会问题<sup>①</sup>,故本文不揣冒昧,试予论之。

## 一、黑龙江源的淘金业与早期国际移民

北纬50°和60°之间有一条含金带横贯亚洲大陆,从乌拉尔山到兴安山(雅布洛诺夫山脉)西坡以及勒拿河和安加拉河之间的山脉都发现了黄金。乌第河与同样注入鄂霍茨克海的黑龙江(阿穆尔河)都在这条金矿脉上。黑龙江水系的“石勒喀河、额尔古纳河、鄂嫩河、精奇里江(结雅河)、奥戴河、牛满江(布列雅河)等河谷地区,即赤塔、尼布楚、海兰泡、庙街与伯力铁路沿线,是矿业化最高、黄金冲击层和金矿储量最高的地区。金矿层主要在黑龙江河床上……位置浅,非常宜于开采”<sup>[1]316</sup>。从地缘政治角度讲,直通大海的外流河——黑龙江从17世纪起即成为俄罗斯海洋扩张的战略目标之一<sup>[2]</sup>,而东西伯利亚和黑龙江水域的黄金则是其海洋战略得以实施的物质支持,“俄帝国向东延伸的每一步,从乌拉尔山至鄂霍茨克海,都是以黄金的发现为先导的”<sup>[3]374</sup>。俄国更于1849年官宣其跨贝加尔远征中国东北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划定与中国的边界线,寻找黑龙江流域的金矿脉<sup>[3]375</sup>,因穆拉维约夫早已探知“黑龙江盛产

[收稿日期]2020-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BZS106)。

[作者简介]赵欣,女,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sup>①</sup> 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漠河金矿。代表作品有何汉威《清季的漠河金矿》(《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6.1);曲从规《漠河金矿与李金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4);贾熟村《李鸿章与漠河金矿》(《安徽史学》1996.4);蔡永明《洋务企业的近代股份制运作探析——以1889—1898年的漠河金矿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4);侯雁飞《关于漠河金矿与三姓金矿几个问题之比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刘潮《李金镛与漠河金矿的创办与发展》(齐齐哈尔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多篇论文。涉及黑龙江金矿的整体性研究有翁文灏《黑龙江金矿调查记》(《矿冶》1928/2/5);贾诚先《民国时期黑龙江省商办金矿》(《黑河学刊》1989.1);郭海南《清末东北矿权交涉研究(1905—1911)》(2014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等少数几篇论文。相关度较高的英文论文仅见两篇:Mark Gamsa,“California on the Amur, or the ‘Zheltuga Republic’ in Manchuria (1883—1886)”,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81/2 (2003); O. I. Kurto, *Zheltuga Republic: “The Ca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Chinese-Russian Border”*,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39/3 (2011)。

黄金”<sup>[4]33</sup>。

显然,俄国向黑龙江流域的战略移民是以追求黄金与毛皮的利益为基石,由西西伯利亚向东西伯利亚渐进式推进的。沙俄先征服西伯利亚汗国,1619年在叶尼塞河中游建立叶尼塞斯克堡,1632年在勒拿河右岸建立了雅库茨克堡,作为俄国入侵外兴安岭及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据点。1640年代,一名波兰罪犯和其他流放犯从叶尼塞逃至黑龙江源发现了黄金,继而建成一个名为涅尔琴斯克(尼布楚)的要塞专事淘金。后来探知黑龙江上源石勒喀河和雅克萨“那里有达翰尔人,蕴藏着金、银、铜矿,出产貂皮”<sup>[5]</sup>,于是入侵黑龙江上游,建立雅克萨城,向当地通古斯人强行征税,与之争夺金源,冲突不断。至1682年末,俄国已在“黑龙江上游雅克萨周边建立数个村庄;结雅河畔建立3个村庄;艾姆贡河建了据点,黑龙江河口建立两个据点”<sup>[6]</sup>。康熙闻讯于二十五年(1683)出兵征讨,在雅克萨屡挫俄军,双方于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基本划定中俄疆界,“从黑龙江支流格勒必齐河到外兴安岭直到海,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罗斯。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南属中国,北属俄国”<sup>[7]</sup>。

疆界虽已大定,但黄金的诱惑使中俄双方淡化了疆界之分而不断强化矿区殖民。确切地说,此期向远东迁徙的俄国主体移民是被动的流放犯。据官方统计,1823—1863年间,俄国有35.6万人被刑事法庭判处流放西伯利亚<sup>[8]</sup>。另据统计,1840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的殖民者有134630人,其中64340人在西西伯利亚,70290人在东西伯利亚。后者有11000人在(黑龙江)从事采金工作<sup>①</sup>。可见,淘金是俄国早期移民的主要生产和生活方式。而向黑龙江源金矿迁徙的华人则多是具有冒险和投机心理的自由移民。后来随着淘金红利的增加,中俄淘金移民整体上转向了自主移民。18世纪后半叶,尼布楚金矿雇佣了大约2000名俄国囚犯,与自由殖民者的数量相当。至19世纪,有1.1万名农民自主移入,采金者多达15000人<sup>[3]375</sup>。1832年至1850年,尼布楚环线(沙俄领地)产粗金约9000磅。1850年发现富矿后,对淘金工人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特别是1861年,俄国废除了农奴制,许多获得人身自由的农奴出于对土地的渴望,不顾一切地向西伯利亚挺进。1863年,尼布楚金矿又适时向自由劳工开放,致使中外大量淘金客涌入。淘金者三五成帮,合作淘采,每日上缴所采砂金,俄政府则以收购的形式给付一定量的货币。在生产并未提高的情况下,该地砂金产量的提升足以佐证淘金人数有了大幅增加。1851年至1874年,尼布楚砂金的上缴量升至97500磅,共有106560磅粗金从大约16.5百万吨砂砾中淘出,相当于每吨淘出1.25美元,远高于今日矿石的含金量<sup>[3]387</sup>。随后5年,砂金产量约增加50%,但后来又回落到1吨半<sup>[3]378</sup>。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并非砂金产量减少,而是私藏砂金者数量不断增加所致。私藏砂金可使淘金者获得远大于其工钱的利润,因此这也成为刺激黑龙江源移民持续增长的原动力。1866年,俄当局准许私矿主进入。1868年,阿穆尔上游公司进驻。私矿主按地缘自成帮派,按先后来后的顺序划分作业片区,产金虽按令统一上缴,但私藏者屡禁不绝,而以采金业为主要经济支撑的尼布楚移民区亦随之不断拓展,成为俄国向黑龙江中下游继续扩张的重要补给站。“地虽极边苦寒,顾饶金银,乃并发减死一等者往采如律,比遂商贾麇集,屯牧骈罗,尼布楚城已为重镇。”<sup>②</sup>1857年至1870年间,俄国探矿师多次以此为基地勘察黑龙江流域,发现了多处有价值的金矿脉。但按照国际惯例,已知矿脉需拥有主权后才可开采,因而黄金的诱惑成为俄国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刻意向清政府索取黑龙江北大片土地的主要动机之一<sup>[4]33</sup>。

1850年代早期,旧金山发现黄金的消息传来,盛传当地政府广招难民前去淘金,于是中俄难民闻讯后乘独木舟下至黑龙江,欲借乘与旧金山贸易的皮货商的船至阿留申群岛后再赴北美淘金。中俄两国政府对此严格限制,致使成功到达太平洋彼岸者少之又少,余者多留在黑龙江淘金,淘金群体得以进一步壮大。如果进行横向比较,可见此期旧金山彻底终结了西伯利亚在世界黄金生产中的主导地位。然而,英美虽在政治上控制了金沙主产区,但其所有金矿区的产能都已达到峰值,独俄国东西伯利亚的河

① Address to His Excellency James K. Polk,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8, 1848, Memoir, Geographic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Capabilities for Commerce of Siberia, Manchuria, and the Asiatic Islands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Ocean. Congress, 1<sup>st</sup> Session, Senate.

②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45。

流仍有巨大开采空间。据统计,1814—1880年俄国黄金总产量中乌拉尔贡献27.6%,西伯利亚西部贡献6.4%,东西伯利亚贡献了66%<sup>[3]387-388</sup>,而东西伯利亚的砂金主产区即在黑龙江流域。1860年,俄当局获得了黑龙江左岸主权后即着手开采。黑龙江源的鄂嫩河砂矿即为俄国以尼布楚为补给地建成的大型金矿企业。其后再以该矿为基地,向黑龙江中下游推进,中游的海兰泡砂矿,鄂霍次克海北部、庙街的科尔砧砂矿等渐次建成,年产金砂值超过100 000 000美元。

可以说,黑龙江源头的早期淘金业是对北亚大陆金矿脉纵深线的全新探索,金矿的运作和经营亦是西伯利亚传统淘金模式的延续。淘金主体人群起初主要是由被动迁入远东的俄国流放犯组成,使早期金矿区移民的多寡与俄国政治事变呈现出了一定的共振性,脱离了单纯的趋利模式。这些矿工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男性,他们没有家眷,致使黑龙江早期的淘金社区的人口结构单一,具有不可再生性。唯一与西伯利亚其他金矿区区别的是,黑龙江源的金矿因地缘上接近中国边疆,因趋利所至的淘金华工逐渐改变了俄矿沉闷、消极的开采模式。华工每日在齐腰身的水中淘洗矿砂,不畏艰辛。俄国金矿主更倾向于吸纳华工加盟,并开启了将金源转租或承包给华人工头的次级开采体系。在金沙沉积丰富的黑龙江源,勤劳的华人劳动力与消极怠工的俄国流放犯并不存在恶性的利益竞争,二者的生活区天然分隔,而在淘金作业区则多有合作。当黑龙江在政治上成为两国界河之后,中俄淘金客在经济上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地域分割,协作共生的局面反而进一步加强。

## 二、“热尔图加”淘金热与首个国际移民社区的形成

1863年,黑龙江漠河(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俄国称之为“热尔图加河”,为区别于中国漠河金矿,此处从俄称)发现了丰厚的金矿床。当消息传至西伯利亚各矿营后,数千俄国人,主要是逃犯、库页岛的退伍军人和从卡拉金矿(石勒喀河支流尼布楚流放地)逃跑的工人<sup>[9]241</sup>,与西伯利亚的农民、中产阶级混在一起,放弃了在赤塔或尼布楚的工作和家庭,涌向热尔图加淘金。来自山东和河北的难民也纷纷前往,甚至在冬季,中国淘金客仍以雪橇和步行的方式艰难地通过海兰泡至热尔图加之间800余公里的距离,跋涉约4个星期抵达<sup>[9]239</sup>。大量涌入的国际移民从侧面证实了热尔图加金矿是前所未有的富矿。该矿成为北亚金矿脉东向纵深延展的关键节点,对来自不同国家、地域的各色人群形成了强大的诱惑,使之能突破政治、地域、语言等自然障碍而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标志着黑龙江金矿移民已经大致转向了自主移民。此期矿区殖民者出现了女性群体,但其多属于以趋利为主的性工作者,因此矿区殖民人口的自我更新仍无法实现。此外,因赴热尔图加路途遥远,奔往该地的部分淘金者开始就近在黑龙江中下游淘金,带动了黑龙江流域的全方位移民。

据俄方统计,1882年黑龙江流域共有15 000名华人,41 500名俄国人。1885年的乌苏里江流域有10 353名华人,还不包括一年数月跨境过来的数千名土匪<sup>[10]310</sup>。而据中方统计,光绪十年(1884)黑龙江华人淘金客只有四千余人<sup>①</sup>。因私采金砂有违大清律,所以该数据不排除地方官为规避责任而瞒报非法参与俄矿人数之嫌。另据俄文文献,1885年,参与热尔图加淘金的俄国人有九千左右,中国人有六千余<sup>[11]135-142</sup>,还有少量犹太人,来自朝、德、法、美、波兰、西伯利亚等多国、多地的淘金客。从人数上看,仍以中俄双向移民为主流。据不完全统计,该地1885年产金值达219 000两之多<sup>[12]236</sup>。先期进入热尔图加的俄国矿主搭起了大大小小的采矿营地,之后再将这些营地租给华人、朝鲜人等。起初,为争夺富矿和售卖渠道等资源,来自不同地域的淘金客时有械斗发生,无序的抢劫和杀戮促使淘金客们自发组织起来,一位俄罗斯政治流亡者成为这个复杂的国际移民区的领导者。他宣布在全体成员平等的基础上成立“热尔图加共和国”,以此来管理这个多民族混居的淘金群体。

这个非法的所谓的“共和国”建立初期,就召集了10个工头制定了“法令”,建立了20条行规,并宣布将重新分配闲置的矿井,列出了一系列罪行及其相应的严厉惩罚措施<sup>[9]252</sup>,以公选的方式按比例在多

<sup>①</sup> 一说光绪八九年(1882—1883),中俄聚集采金者达一万数千人。见翁文灏《黑龙江金矿调查记》《矿冶》第2卷第5期,1928年8月,第51—52页。

种族聚居区投票选举治理委员会和“总统”，奠定了所谓“共和国”的行政基础。其社会治理依靠严格执行律法，次级行政管理依靠再度公选，帮会之间提倡密切合作等方式进行<sup>[11]135-142</sup>。在这个体制下，矿区很快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秩序，中外淘金客规范合作，淘金队伍持续壮大。这个以黄金发现地为核心的点状工业殖民区突破了传统的农业殖民模式，以工业为经济纽带组建成跨越种族、语言和文化障碍的固定移民社区，带动了与之密切相连的建筑、商业、休闲、娱乐等产业的发展。热尔图加金矿区建立700余幢永久性房屋，500余间地窖，开设了18家旅馆和客栈，还开设了“1家音乐剧院，组建了一个合唱团，1家照相馆，1家桌球馆，1个马戏团，2家珠宝商店，7家澡堂和大约160家商店”<sup>[11]135-142</sup>，甚至还设立了医院、游乐场、法庭、妓院等机构<sup>[12]235</sup>，贩卖金子和烈酒的商人往来穿梭，繁荣程度可见一斑。

可见，以热尔图加为代表的黑龙江上游的金矿区摆脱了季节性流动的殖民模式，形成了配套设施齐全的固定社区<sup>[13]51-52</sup>，创建了黑龙江上游首个中俄民众的自发互惠型社区，较之类似的哈尔滨社区早了十余年，成为黑龙江流域早期经济开发的重要窗口，折射出该地畸形的工业繁荣。在交通不甚发达、支柱产业单一的纯工业社区，依靠复制西方共和体制取得了短暂成功。如果考虑黄金的极度诱惑、中俄对峙的特殊关系及语言生活习惯等多种可能诱发冲突的元素，热尔图加地区的“和谐”的确创造了奇迹。该地并未出现极端的争夺状况，甚至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还参加了热尔图加首任统领的选举，并担任十个指定工头中的两个代表<sup>[9]239</sup>。可见，在劳动密集型的原始淘金工业中，人力资源是实现黄金价值最大化的唯一客体。事实证明，中国淘金客在将热尔图加的黄金运往中俄接壤的艾贡和恰克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9]239</sup>。在资源相对丰富的采金业中，合作比竞争更重要。这种合力拉动了周边地区辐射性的、点状经济区的开发。如最早供应金矿区补给需求的只是邻近的伊格那西诺、波克罗夫卡等哥萨克村庄，但随着淘金队伍的壮大，方圆200俄里内的面粉及小麦种子都被贩运进来，导致赤塔、尼布楚、伊尔库茨克等地的物价上涨失控<sup>[11]135-143</sup>。但这也从侧面说明人口的持续流入使金矿区的经济辐射范围在不断延伸，犹太商人和俄基督徒甚至开始从德国汉堡进货<sup>[11]135-142</sup>。再如黑龙江中游的海兰泡、热尔图加以西420公里处石勒喀河上的斯列腾斯克村，分别是来自中国关内和俄国东西伯利亚的淘金客涌向热尔图加的必经之路，也因热尔图加而发展成了较大的补给点和黄金输出站。这些地方人员辐辏，其所建立的居民点以黑龙江为轴线呈对称性发展，“工人麇集，商贩亦接踵而至，渐知通商之利。于是修筑房室，开设小铺，凡俄屯之对岸无处不有。视俄屯之大小定铺数之多寡，或一处或二三处不等”<sup>①</sup>。海兰泡发展成阿穆尔地区金矿工业的中心，对岸的黑龙江城（黑河）亦同样发展起来。然而，热尔图加金矿区虽然盛极一时，但由于缺乏农业根基，人口结构不合理，再加上交通不便，致使其经济辐射能力有限，未能形成自给自足的线型产业链，更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尤其关键的是，该社区是建立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公然违犯了国家主权，昭示了这种早期工业硬殖民的“短命”。

### 三、黑龙江上游金矿的企业化运营与国际移民区的拓展

随着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不断坐大，清政府闻讯于1886年出兵将之摧毁，原有的各式建筑皆被付之一炬，致300余华工丧命，俄国淘金客撤回黑龙江对岸，大批华工随之而去。不久，清政府即动议在热尔图加西北30公里处的老金沟筹开漠河金矿。由于原金矿区的主体人群是俄国人，其经济辐射区亦集中在黑龙江左岸，清政府要建立完全脱离俄国管控的中国金矿必然困难重重，但北洋大臣李鸿章坚持开办。这是因为，筹开金矿一来“以杜外人觊觎”，更在于当时国际金融大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世纪70年代起，欧美操控下的国际贸易放弃了金银复本位制而独行金本位制，金价步步高，而中国仍行银本位制，以银换金，亏本日甚，因此清政府急于增加黄金储备。为增加胜算概率，李鸿章遴选熟习矿务和东北事务的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主筹漠河金矿。李金镛原计划通过上海、天津富商以集资入股的形式筹银20万两，但商贾皆惮漠河偏远，矿业难兴而积极性不高<sup>②</sup>。李艰难筹措岁余，至

① 《远东报》宣统二年（1910）七月六日星期二。

② 《皇朝续文献通考》卷44。

光绪十三年(1887)十二月,只得官商资本 15.93 万两白银<sup>[12]238</sup>,遂先在漠河、奇乾河建厂。次年夏,“购办粮食、装运轮船,由天津、上海解运机器、枪械一切器物到厂”<sup>①</sup>,后洛古河、洼希利、达义河(瑗珲西山)、观音山等金厂相继开工,因总局设在漠河,统称漠河金矿。

漠河金矿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在极边地区的一个缩影。它的建立标志着黑龙江右岸由自发的行帮式淘金转向了官督商办的企业化管理与运营,由于官方投入的力度较大,致使热尔图加金矿的废墟短期内就重现了生机:一、金厂与地方政治经济紧密结合,殖民产业链初步形成。李金镛在天津、上海、瑗珲、营口、奉天、齐齐哈尔和俄国的聂格来斯设立了金矿办事处,以“购买粮货或招徕商股”<sup>②</sup>,保证了金矿可持续发展的官方补给源。同时,鼓励地方农业,致力于实现地方经济的良性内循环。“开厂后招回流民数千,募练护矿防勇一营,并于漠河口各处建造房屋,广集商贩。沿江平旷之地,设法垦种,屯牧并兴……三年来,先后出金砂六万二千余两。除陆续归还借款分给股商官利外,所有勇夫、饷械、运粮及各局经费,均由该厂筹给,不费公家之款,并提存余利解充黑龙江军饷,以伸报效。”<sup>③</sup>。矿区周边“兵民辐辏,商贾繁兴,屹然为边陲重镇……上至奇乾河,下至爱(瑗)珲,沿江二千余里,员弁、丁夫来往不绝”<sup>④</sup>。二、引进股份制管理经营模式,增强对华工回流的吸引力。在热尔图加金矿被摧毁时逃往对岸的华工原本在伊格纳西诺和波克罗夫卡行乞,后来多数进入阿穆尔区俄国私矿,为之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替代品。因其相关待遇优于中国同期矿主,且可偷藏砂金,所以在俄矿采金的华工较多。为此,李金镛在收益分配上与矿工四六分成,对政府与股东则延迟报效分红,同时以发行银票的方式来弥补运营资本不足的问题,充分调动了华工回流的积极性,砂金产量大增,1889—1891 年漠河金矿共上缴军饷银 131.21 万两<sup>[14]</sup>。然而,漠河金矿变更的主体只是经营管理模式,实际生产仍用土法,“掘出来的砂石,放在凿有多孔的铁板上,用水冲洗,并以铁器敲碎。铁板下面置有如梯状多横木的木槽,金沙沉淀在铁板或木槽上,碎石或砂泥则被水冲走或抛弃”<sup>[12]242</sup>。显然,这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原始生产方式效率低下,亟待改观。

然而,漠河金矿生产模式的变革并非经营者主动争取,而是俄国侵夺了漠河金矿主权后的自然转移,这种被动式改革注定了中国近代官督商办企业下行的命运。1900 年俄国借庚子之变侵占了漠河金矿区。由于俄占期间实施机械化开采,作业层面深且广,致使中方 1906 年收回后续行的人工采掘弊端立见。清末官办的黑龙江金矿不得不在技术、补给方面严重依赖俄国,致使其在资金和管理上频出问题,“工业没有进步,而是连年下降……缺乏资金进行昂贵的勘测,购买外国改良机器、挖泥船等”<sup>[13]52[15]375</sup>。在此情形下,官办的黑龙江金矿在一处产能下降时就另辟新矿。距墨尔根城 70 公里远的墨尔根金矿、乾北涧金厂、乾西涧金矿、瑗珲西山东沟金矿、观音山东沟金矿等相继建成。基于此,淘金产业工人的居住地也随之流动,殖民产业链时断时续,无法固定。由于探矿不精,人工浅层作业,虽金矿频开,产量却未见提升。据 1908—1909 年黑龙江省矿业办公室统计,黑龙江金矿年产金量为 120—128 普特,其中黑河地区 110—115 普特,墨尔根地区 3—5 普特,巴尔虎地区 10—13 普特。该数据仅代表上交官衙的黄金,不包括总产量约 30% 的未交黄金<sup>[15]375</sup>。至 1911 年,漠河金矿由北洋官办转为黑龙江省自办,产能“渐采渐衰,今则不过千两左右”<sup>[13]52</sup>。矿区的高流动性与配套产业的缺失致淘金华工再次大批流向了俄国的金矿区。

黑龙江对岸的俄国金矿亦于 1890 年代进入现代企业化运营阶段。阿穆尔总部哈巴罗夫斯卡(伯力,哈巴罗夫斯基前身,时有 5 000 人)新任总督科尔夫在本国人力资源有限的状态下,不得不同意出让一部分利润以换取华人劳动力,中俄联合采金的传统在黑龙江左岸得以延续。因俄矿待遇高于华矿,所以不断有华工流入<sup>⑤</sup>。其后,俄方斥巨资探得额尔古纳河下游、奥列利湖、吉拉河至鄂霍茨克海岸的科

①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矿务档》,1974 年,4410 页。

② 同①。

③ 直隶总督李鸿章为请奖叙创办漠河矿务出力文武员弁事奏折,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藏,《光绪年间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史料》(中),《历史档案》2004 年第 2 期。

④ 同③。

⑤ 参见:东三省政略:卷一,边务·瑗珲篇,第 22 页。

尔河、乌第河等水系都沉积着丰厚的金矿床,采金作业区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其后,俄国在一些重要矿脉上建立了众多采矿企业<sup>[16]56-57</sup>,阿穆尔-奥利列公司、鄂霍茨克海公司和许多小公司纷纷建成投产。公司更新生产技术,“许多挖泥船已投入使用,其中一部分是本土的,大部分是德国制造的,还有一些是英国制造的。特别是在乌拉尔河和结雅河及其支流上”<sup>[17]</sup>。英国的梯形钻、尾矿堆垛机等也有公司引进。机械作业使金矿产能大幅提升,俄国的采金作业范围亦迅速向黑龙江中下游拓展,海兰泡金矿公司、鲍罗温金矿公司、沃尔茨·艾塞特矿业公司、左乌尔斯克矿业公司、新乌德尔斯克金矿公司、奥列卡明斯克金矿公司、普提尔罗夫工厂、A. A. 索夫维尼克继任公司、提普特尔斯克金矿公司、中西伯利亚公司、Y. K. 于斯可夫公司等 46 家采矿公司相继建成<sup>[16]57</sup>。1899 年,俄国注册公司的黄金总产量为 6 349 磅<sup>[16]57</sup>。1900 年,侵占漠河金矿后,“私人矿产得金 48 054 磅。黑龙江地区计 34 500 磅。滨海边疆区为 400 磅,共 189,514 磅粗黄金”<sup>[3]387</sup>。1906 年,俄国向清政府交还黑龙江上游金矿的主权后,即开始对采矿机器征以高关税。此期俄国金企虽雇佣了大部分华工,但仍远不能覆盖其所发现的绵长的金矿脉。余者,俄国在宣告其主权后将之承包给华人开采,华人监工每月要上交俄矿主 8 个卢布左右的租金才获准开采,而且必须将每日所得黄金低价悉数卖给俄矿主。1900—1906 年,俄官方的黄金收购价只有每左尼克(4.26 克)2 卢布 25 戈比。而等量的金子,持有者上交俄财政部时却可得 4 卢布 67 戈比,在实物黄金税取消后还能多得一些<sup>①</sup>。俄国规定虽然苛刻,但对极力想摆脱官督商办企业垄断的华人工头而言仍极具诱惑,且实际开采后,私矿承包者多依靠私藏黄金获利。据估计,以此方式偷运回中国的黄金总量至少占黑龙江流域产金量的 20%<sup>②</sup>。这些因素促使处于最佳采金期的中国官督商办金矿被迫转成受俄国管控的监工型企业。

毋庸置疑的是,中俄黑龙江流域的金矿公司无一例外都是以华工为一线生产的主力军,“大大小小的俄国公司雇佣了数万中国人”<sup>[18]674</sup>。随着开采区的扩大,黑龙江左岸的金矿殖民区不断向中下游延伸,随着大批农业移民(包括妇女)和商贩的迁入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形成了地缘上较为固定的殖民区,对对岸中国流动性的殖民社区形成了强辐射。这样,以黑龙江为中轴线的中俄混居型殖民区得以形成。夏秋之季,华工在金矿劳作,封冻后即返回中国黑河或在海兰泡的中国社区居住。如光绪三十四年(1908),呼玛河发现大量金沙,两岸华工蜂拥而至,“夏秋以来,该处(瑚玛尔)矿丁涨至三千余名”<sup>③</sup>,附近金山镇还有 500 名日本淘金客<sup>[19]</sup>。1910 年以后,许多在俄领地精奇里江(结雅河)和色楞姆地区的中国矿主被俄激进党人驱回中国东北。而次年,当俄国在阿穆尔省的乌里亚吉尔——苏格扎里地区、金兰扎克河、库普里河也发现了砂金冲积层时<sup>[20]</sup>,这些华工随即又流向这些地方。中外采金者在频繁的跨界流动中彼此的依赖性持续加强而非减弱。1910 年后,华人金矿主经常雇佣俄国采矿工程师负责管理企业,整个黑龙江皆如法炮制<sup>[15]375</sup>。一些英美采矿公司也开始插手。如清政府雇佣美国化学师分析金沙成份。20 世纪 20 年代,英方就开发黑龙江右岸呼玛河金矿与中方达成基本协议……<sup>[21]</sup>可以说,1924—1925 年,围绕着黑河的国际黄金开发时代到来,黑龙江至少有 113 座金矿被开发,皆为中外官企,共有 10 513 英亩的金矿床被淘洗<sup>[22]</sup>。1923 年,俄方统计阿穆尔地区的产金量为 281 679 公斤(9 013 728 盎司)<sup>[1]316</sup>。

随着有多重交叉的中俄采金业的持续拓展,相对固定的中外矿工混居的殖民区亦在不断扩展,带着农业、商业等产业链稳步发展与完善,并逐渐形成了脱离矿业经济支撑的其他产业。俄国修建了乌苏里铁路和跨贝加尔等铁路穿越黑龙江主要矿区,各大重要金矿之间也修建了公路,架设了电报线,以水路、公路、铁路联通的立体交通网覆盖了黑龙江全流域,在提升了矿区的内聚力的同时,打造了中外共用的一条新的黄金运输线:黑河→海兰泡→海参崴→天津→上海。黄金运输线上的关键节点因冶金、酿造、商贸等产业合力支撑而率先发展成了区域性中心城市。如黑河“各厂金沙由此汇解内地,津、沪运来

① Gold and Platinum, XII1906, p. 239. Cf. Gerrare, Greater Russia, p. 124.

② “Vladimir”, Russia on the Pacific, p. 137.

③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矿务档》,1974 年,4723 页。

饷银及各厂粮货等物,亦皆由此分途转运,实为矿务咽喉”<sup>[23]</sup>。至 20 世纪 20 年代,“黑河现为沿边重镇,中俄贸易往来及矿工出入,多经此地……镇守使及其他重要官署,皆在黑河”<sup>①</sup>。中俄混居社区扩展尤快。赤塔、伯力、海参崴等黄金输出线上的关键节点也都发展成了区域中心城市,城中皆有由华人淘金客和华商组成的中国社区。1900 年,阿穆尔省中国人和朝鲜国人是 6 000 人,占当地俄国总人口的 16%。1904 年后,中国人和朝鲜国人增到 12 万,接近俄国远东四分之一人口<sup>②</sup>。1917 年大革命前俄国远东充满了生机<sup>[18]675</sup>。如作为整个东西伯利亚黄金工业中心的海兰泡更是全城通电,夜晚灯火通明,人口达 33 000 余人,驻有 5 000 步兵和 300 骑兵,城中有三家大型旅馆<sup>[24]</sup>。至 1920 年代,俄国采金业虽开始回落,但人口流入远东的趋势随着世界大战战火的延伸而持续加强,1927 年,“北满”人口达到了 836 000 人<sup>[25]34</sup>。

表 1 1906—1910 年中国淘金者在黑龙江地区淘金工业中占比<sup>[10]324</sup>

年份	俄国人		中国人		朝鲜国人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1906	8 909	56.0	3 320	20.0	4 006	24.0
1907	6 675	45.0	5 087	32.0	3 600	23.0
1908	5 475	37.0	7 582	49.0	2 159	14.0
1909	5 013	26.0	11 691	62.0	2 159	12.0
1910	3 336	16.6	16 622	82.7	150	0.7

#### 四、结 论

黑龙江流域早期的采金业是中俄政府实施的国家战略目标之一。采金业所拉动的工业硬性殖民,以地处北亚金矿带的黑龙江为中轴线,稳步地从中俄两个方向以渐进的方式交叉推进,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排斥到融合的过程。这种工业硬殖民因与传统的农业殖民规律相悖,以至于在最初出现了产业链断裂、工业生产难以长期持续等诸多负面效应。然而,随着采金业的经营模式与技术的革新,黑龙江流域的采金业得以发展壮大。而与之同步发展的中、俄金矿殖民区,在交通困难、生存环境恶劣以及黄金的极度诱惑下,并没有走向暴力的极端。相反,他们构建了跨越政治边界、语言文化等多重障碍的“和谐”的新型移民社会,创造了多种族工业移民聚居区的理想模型,对世界各地的难民形成了持续性的牵引力,并最终形成了以矿业带动农业、商业、工业等其他产业的多元经济发展模式,牵动了黑龙江两岸的持续性开放与开发,提升了黑龙江流域的整体战略地位,促进了西伯利亚远东大移民潮与清末大移民潮向以黑龙江为中轴线的极边地区的持续流动<sup>[25]34</sup>。

#### [参 考 文 献]

- [1] L Shlounde M Sc, F C S M I M E. Gold mining in soviet russia[J]. The Far Eastern Review, July, 1932, XXIII(7).
- [2] ALEXIS KRAUSSE. Russia in asia, a record and a study, 1558—1899[M].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899: 3.
- [3] DEL MAR. Alexander, 1836—1926, A history of the precious metal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M]. New York: Cambridge encyclopedia co., 1902.
- [4] 巴尔苏科夫. 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 第 2 卷[M]. 黑龙江大学外语系,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4.
- [5] 库德里亚采夫. 布里亚特蒙古史[M]. 乌兰乌德, 1954: 47.
- [6] LAVENSTEIN E G. Russians on the Amur[M]. London: Trubner and Co., 1861: 44.
- [7] 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 1 册[M]. 北京: 三联出版社, 1957: 1.
- [8] ANATOLE V BAIKALOV. The conquest and colonisation of siberia[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932, 10(30): 569.

① 翁文灏:《1928 年黑龙江金矿调查记》,《矿冶》十七年八月。

② Nansen, Through Siberia, p. 336. Population figures for 1911 are as follows: Russians—632,534 (74.2%); Chinese and Koreans—156,606 (18.3%); native Siberian peoples—28,092 (3.2%); others (Uralo-Altaic peoples, Europeans, Russian Jews)—37,772 (4.3%).

- [9] MARK GAMSA. California on the Amur, or the 'Zhelutga Republic' in Manchuria (1883—1886)[J].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2003, 31(2).
- [10] LEWIS H. Siegelbaum, another "yellow peril":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Russian far east and the Russian reaction before 1917 [J]. Modern Asian Studies, 1978, 12(2).
- [11] KURTO O I, ZHELTUGA REPUBLIC. The case of social development at the Chinese-Russian border [J]. Archaeology Ethnology & Anthropology of Eurasia, 2011, 39/3.
- [12] 何汉威. 清季的漠河金矿[J]. 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 1976, 8(1).
- [13] 翁文灏. 黑龙江金矿调查记[J]. 矿冶, 1928, 2(5).
- [14] 黑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黑龙江省志·黄金志[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400.
- [15] KORMAZOFF V A. Gold mining in heilungkiang province [J]. The Far-Eastern Review, 1927, XXIII(8).
- [16] The Gold Resources and the Gold Mining Industry of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Z]. the Special Delegation of 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hington, D. C. , 1922.
- [17] JOHN ERNEST HODGSON. The dredging of gold placers [M]. London: Sir Isaac Pitman & Sons, 1911: 8.
- [18] EVE Y T. Gold occurrences in the Zeya central mining area of eastern siberia [J]. The Far-Eastern Review, 1923, XIX(10).
- [19] 滿洲事情案內所. 滿洲事情案內報告(85) [J]. 滿洲國地方誌, 193 ? : 165-166.
- [20] EARL T C. Gold dredging [M]. E & F. N. Spon, Limited, London, 1919: 190.
- [21] Mines and Mining [J]. The Far Eastern Review, 1920, XVI(9): 505.
- [22] Adachi Kinnosuke. Manchuria [J]. A Survey, 1925: 203.
- [23] 光绪年间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史料: 下 [J]. 历史档案, 2004(3).
- [24] Alexander Hoise. Manchuria, its People [M]. Resources, and Recent History.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45.
- [25] STEWART JOHN R. Recent development in manchuria [J]. Journal of Geography, 1935.

## Study on Early Gold Mining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1850—1920)

ZHAO Xi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Jilin Normal University, Siping 136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850s, the development of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brought industrialization in Northeast Asia due to its abundant placer gold reserves that were easy to be mined manually. Taking the gold mining area as the origin, it has thrived the centripetal immigrants composed of gold diggers from China, Russia, Japan, and North Korea. With the gold mining area expanding from the source of Heilongjiang to the upper,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these gold-seeking immigrants formed into groups and flowed with Heilongjiang as the central axis. Therefore, a new type of international immigrant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fixed industrial immigrant communities has been established, which surmounts multiple barriers such as politics, race, language, and culture. It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 diversifie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with industry as the locomotiv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Heilongjiang River Basin; Gold Mining Industr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责任编辑: 王 晓]